



王廷洽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K877.6/8

中国印章史 王

王廷洽 著



中国印章史

RBA 6P/09

1525590

责任编辑 王 焰

封面设计 高 山

装帧设计 李慧耀

中国印章史

王廷洽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17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0 本

ISBN7-5617-1643-5/J·035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卷首语 作为文物的印章	(1)
第一章 百花齐放的先秦玺印	(14)
一、玺印的起源	(15)
二、商周春秋玺断代初探	(17)
1. 商玺	(18)
2. 西周玺	(21)
3. 春秋玺印	(25)
4. 战国玺印	(30)
三、百花齐放的玺印艺术	(34)
第二章 始有定制的秦汉官印	(39)
一、秦代玺印	(40)
二、两汉官印制度	(43)
1. 玉玺	(43)
2. 黄金玺印	(46)

3. 白银印章	(52)
4. 铜印章	(56)
5. 其他官方印章	(57)
三、用印制度与习惯	(64)
1. 封缄实物的基本方法	(65)
2. 书信的封缄与传递	(67)
3. 传檄上的用印制度	(69)
4. 新习惯的出现	(73)
四、汉印艺术赏析	(78)
1. 印章的制作	(79)
2. 书法艺术	(83)
3. 印面设计艺术	(91)
4. 精湛的刀法	(98)
第三章 转换期的魏晋南北朝官印	(100)
一、传国玺的真伪问题	(101)
1. 得玺与传授的故事	(101)
2. 传国玺名义	(106)
3. 传国玺自制说	(110)
二、官印特点	(116)
1. 形制变大	(116)
2. 螭凿印多	(118)
3. 印章艺术的衰落	(121)

4. 几种新现象	(123)
三、印钮印绶及其他	(126)
1. 印钮	(127)
2. 印绶	(130)
3. 鞶囊	(133)
第四章 唐宋以后各代官司印	(135)
一、历代宝制	(136)
二、官司印的出现	(149)
1. 职印变司印的原因	(150)
2. 司印的特点	(151)
三、新创造及其他	(156)
1. 可转动的圆印	(156)
2. 印纸币的会子印	(157)
3. 官司印的保管和使用制度 ...	(158)
4. 官衙门论品设印	(158)
5. 农民政权使用的印章	(161)
第五章 多彩的私印艺术	(166)
一、私印的种类	(167)
二、私印的艺术成就	(178)
1. 石料的普遍使用	(178)
2. 边款艺术的产生	(180)
3. 丰富多彩的朱文印	(184)

卷首语：作为文物的印章

玺印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信用物。在我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中，古玺印还是一种吉祥物，是标明能获得福份的符瑞。王莽在建立新王朝时，首先想到的是向他的姑母孝平王皇后索要象征权力的汉传国玺。因为他相信谁得到前代皇帝玺印，谁就能得天下。北周宇文氏原为鲜卑十二部落首领，传至普回时，在一次狩猎中意外地得到三枚文为“皇帝玺”的玉玺，于是根据本部落的风俗，称天为宇，称国君为文，定其家族姓氏为“宇文”。后来竟建立北周王朝，称帝二十余年。据说即使得到一方普通的前代官印也能获得富贵，或者至少能避免邪恶，确保康隆安宁。这当然是说说而已、无法验证的传统观念。而古玺印的文物价值远不止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古玺印既有官印、私印之分，流传至今的实物中有大量的官印，它们显然是研究历代官制和政府机构

的重要实物见证。王国维为罗振玉所编《齐鲁封泥集存》作序,说:“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接着王国维举例说明了封泥(即玺印)对于研究古代官制的价值和意义:汉代诸侯王的官属同汉朝廷的官属差别不大。《汉书·诸侯王表》说“藩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说“诸侯王、群大夫、都官如汉朝”;贾谊《新书》也说“天子之于诸侯,臣同、御同、宫墙门卫同”。开始时怀疑这些记载,而封泥中所见汉齐封国的属官除了丞相、御史大夫以外,还有大匠,与朝廷的将作大匠相当;长秋与朝廷的大长秋相当;下至九卿所属令丞如太祝、祠祀、园寝、诸宫为奉常之属,郎中为郎中令之属,中厩丞为太僕之属,内官丞为宗正之属,太仓、太官、乐府、居室、谒者、御府、宦者诸官为少府之属,武库丞为中尉之属,食官为詹事之属,钟官为水衡之属。各种官府的属官既已在封泥中得到反映,那么长官、官吏的设置情况就可以明白无疑了,文献中所说的诸侯国宫室、官制同朝廷一样,也就得到了证实。所差异者,级别地位而已。另外,封泥中还有许多官职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中所遗漏的,如洛阳宫丞、洛阳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齐司宫丞、齐左工丞、菑川郎丞、载国大行、水丞、平丞、陶丞等等,都可以弥补史籍所记官职的缺漏。王国维仅列举了齐鲁封泥中所见官员的情况,我们更可以通过此一斑而观全豹,现存古印章对研究历代官制和政府机构,具有十

分重大的价值。

第二,由于官印中有大量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印章,所记地名显然是研究历代地方行政建置的重要实物见证,又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遗漏、纠正失误。《齐鲁封泥集存序》也列举了大量事实:有临菑、济北郡太守封泥,有河间、即墨郡都尉封泥,有城阳郡守、尉封泥,这数郡都未见《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书·汉帝纪》说:“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二县立子肥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说:“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可知汉初齐地有临淄、城阳、济北三郡。《楚元王世家》“取赵之河间郡,立赵王遂弟辟疆为赵王”,又知时有河间郡。“临菑守”一印。根据汉初制度,建立封国后应称为内史,国除而设郡,则应称齐郡太守,而此印称“临菑守”,可见铸于汉高祖初年、悼惠王未封之前,而且“临菑”两字更应该是秦代的郡名,汉初承袭秦代郡名。班固记作齐郡为秦名,而不说明“秦临菑郡”,实误。“河间太守”、“即墨太守”印和吴式芬《封泥考略》所录的“胶东太守”、“胶西太守”二印,都可以补《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缺漏。还有“卢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县邑印,更是地方行政建置的重要物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而《齐鲁封泥集存》有 28 方封泥称“邑丞”,其中琅邪为鲁元公主食邑、“载国大行”称国外,其余都称邑,可见列侯食邑可称国,也可称邑。另外《史记》、《汉书》记驷钧的封国为清郭、靖郭、清都、郕、巢

等,及见封泥“请郭邑丞”、“请郭丞”,知请郭为正。华毋害封国《史记》作绛阳,《汉书》作终陵,及见“绛陵邑丞”封泥,知《史记》阳字误,《汉书》终字误。《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济南有著县,韦昭注著为著龟之著,颜师古认为韦注误,及“著丞之印”封泥出,知韦是而颜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知古玺印之于历史地理之研究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由于古玺印中有一些是关于城市守官、城市关门、里坊的职印,如故宫博物院藏有“平阴都司徒”、“平阴都司工”、“平阴都朮皇”、“洵城都司徒”、“洵城都丞”、“夏虚都司徒”、“万城都司徒”、“柜易都左司马”、“甫易都右司马”、“庚都右司马”、“庚都丞”、“南门之玺”、“□关”、“武关戍”等,上海博物馆藏有“陈之新都”、“平□都玺”、“行人门”、“墉阳门”等。临淄出土古陶器上钤有各陶器作坊和工匠名,这些作坊计有东古梭止鬲里、繇衢右鬲里、繇衢中鬲里、繇衢东鬲里、夔鬲南里、夔鬲鬲里、中夔鬲里、西夔鬲里、东夔邑里、夔鬲杨里、夔鬲鱼里、繇衢瞀里、楚毫衢芦里、楚毫衢雨里、楚毫衢武里、楚毫衢关里、埆鬲豆里、孟棠鬲里、西酷里、东酷里、左南郭衢辛鬲里、衞子里、鬲鬲里、豆里、丘齐辛里、丘齐衢鬲里、丘齐鬲里、右埆、辛鬲埆、南里、北里、左里、卢里等等(高明《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我们看到齐国国都临淄城还有鬲、衢、亭等行政区划,这些区划属下有“里”,这许多“里”又是制陶作坊之所在地。齐桓公时采用管仲的建议,使士、农、工、商分处,工立三属而有三乡。《国语·齐语》说: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陶玺文字或者可与其时的连伍组织相印证。

第四，可以通过古玺印了解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与匈奴的关系，一直是汉代的大事，或进行征伐或采取和亲的方法，至汉元帝时，左伊秩訾归汉，封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王莽建立新王朝，发生了以新印换旧玺的故事：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等人带了厚礼告诉匈奴单于新代汉的事，并需换新印。故印文为“匈奴单于玺”，新莽铸印为“新匈奴单于章”。根据西汉官印制度，皇帝、皇后、诸侯王的印文称“玺”，而比二千石、二千石、中二千石官员的印文称“章”。王莽显然想降低匈奴单于的地位。当交换玺印时，单于的谋士曾提醒他应见到新印的印文后再换，但单于不相信会变更印文，于是上交故印，接受新印，欢宴至夜，各归自己的住处。王骏随从勇武之士陈饶说：“如令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汉书·匈奴传》）于是拿起斧子敲碎了故印。第二天单于果真派人来要求调回原来的玺，因为单于也知道，印文称玺，表明是一方诸侯王，而称章，则已成为新朝的臣下。但见故印已毁，又得到厚礼，只能接受“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的训命，不过事后还是上书要求恢复故印。此换印的事件实际是对匈奴政策改变的反映。《后汉书·乌桓传》说明、章、和三帝时，乌桓“皆保塞无事”，而未言东汉朝廷授予乌桓首领玺印事，而故宫博

博物院藏有数方印文同为“汉保塞乌桓率众长”的驼钮铜印，形稍有大小，但基本式样相同，知颁发有前后。此可补史籍之失载。又《后汉书·东夷传》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光武帝纪》也记有“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语。1784年日本九州筑前国粕屋郡志贺乌（今福岡县志贺町）出土了印文为“汉委奴国王”驼钮金印一方，知日本国曾为东汉藩国。另外，传世有“魏率善羌佰长”、“魏率善氏邑长”、“魏乌丸率善佰长”、“亲晋羌王”、“晋归义羌王”、“滇王之印”等，都反映我国历代与周边地区民族的关系，其价值不待明言。

第五，可以用来研究除正统朝廷以外政权的存在情况。我国传统史籍对那些未能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政权的记载总是比较简略的，对农民起义的政权的记载则更是如此。《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他建立成家政权时仅提到“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一句。1954年在陕西阳平关出土“朔宁王太后玺”龟钮金印。此为隗嚣于龙兴七年（31）投奔公孙述，受封为朔宁王，公孙述为嚣母所铸。后光武征隗嚣，嚣携全家西奔，其母猝死途中，草葬于阳平关附近。印章制作精良，文字俊美，其规制基本同于汉官印。元末农民起义，建立不少藩邦政权，韩林儿称宋、陈友谅称汉都有官印传世，而史籍却不载。1965年河南固始县发现宋政权的“元帅之印”，背刻“龙凤三年十月日”。上海博物馆还藏有“管军总管之印”、“津宁县印”，前者铸发于龙凤元年八月日，后者铸发于龙凤四年。“元帅

之印”印面 $8.9 \times 8.9\text{cm}$ ，“管军总管之印” $8.5 \times 8.5\text{cm}$ ，印制巨大。明末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顺政权，不仅印文不称印，以避李自成父“印家”的讳，而用契、符、信等字，而且篆书也不用元明官印中的叠篆形式，创作了一种直粗横细，苍劲而工整的书体。晚清太平天国铸发的印章则用宋体字，印文有大有小，主次分明，别创一种新印制。

第六，由于印章可分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用法，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用印的习惯和风俗。印章的基本作用是表示某人、某官、某机构的信记。从现有遗留印记的材料看，西周社会即已在青铜器、陶器钤上工匠和作坊名，因为周代已制定对工匠、官员进行考绩的制度。由此可推知，工匠制作的其他器物一般也应钤上印记，故《周礼·司市》说：“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也有“货贿用玺节”语。官属工匠制作的器物也有可能部分地成为个人的财产，可以用于易市。而民间工匠更是以所掌握的技艺换取生活必需品，也应在器皿上钤印记，以确保信誉。古人重视丧葬制度，所用棺槨木材称黄肠木。1956年发掘了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槨木上火烙“邵吕竹正”印。咸丰四五年间(1854)，广东南海人挖地，得汉南越王故冢，有大木数十根，长丈余，方尺余，每根都刻有“甫一”、“甫二”，以至甫几十。此为黄肠木编号刻印记。《水经注·济水》记载：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渠口，谓之石门，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因为古代石槨用石板也称黄肠石，《水经注》所说的用黄肠石造的遏渠石门，乃是用汉灵

帝建宁四年的石椁石块所造。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对仓库、箱笼等进行查封的事，即贴上带有印记的封条，禁止开启。这一做法也是从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习惯。《商君书·定分》说，国家颁布法令，左券发给有关官吏，右券藏于宫廷中的禁室内，“封以法令之长印”，又把禁室的钥匙封以禁室之印，若有谁铤而走险，用钥匙打开禁室，擅改法令文字，即判以死罪。法令的封存是为了查对执行情况。汉印中有一种刚卯印，是用以驱除邪病的。《汉书·王莽传》提到“正月刚卯”，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佩之。”晋灼注中记录了刚卯所刻文字：“正月刚卯既央，灵爰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瘡，莫我敢当。”这类印又因其印文首句为“制曰严卯”（或作“疾曰严卯”）而称严卯。又有的因用桃木做成，可称桃印。可随身佩带，也可挂在门户上。这种习俗虽经曹操禁止，但印章为吉祥物的观念却一直在流传着。居延汉简中记有以印章作凭信领取俸钱的事。开了后来领取薪水、工资需签名盖章的先河。总之，印章分有多种类别，用途也很多，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使用印章的风俗习惯。

第七，玺印原为实用物，沿用既久，便成了艺术品。作为艺术品，其艺术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器物形制的雕刻和铸造技艺；印面文字的书法和镌刻艺术。从现有的实物来分析，先秦印章的艺术处在初始阶段，其造形简单，多为扁方体复斗状，或扁方体、扁长方体，印背铸一

穿钮，以随身佩带。先秦印最多铜质，少量玉质。铜印都是翻砂铸造的，有铜印，必先刻制陶质印。铜印铸成，陶模被毁。铸造印章在先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中，可谓小菜一碟。先秦通行篆书，然其时文字未统一，书写艺术百花齐放。但无论是周秦文字还是六国文字，其基本风格就是古朴、愚拙，线条粗细相兼，印面文字大小排列错落有致。唯楚国的一些玺印文字趋向工整，线条细腻，印制较小巧，似乎对汉代印章影响较大。秦代文字统一用小篆，汉代文字通用隶书，但汉印文却不用隶书，绝大多数汉印采用小篆书体，少量用缪篆（增加笔划屈曲，使印面秀丽华美的篆书）、鱼虫篆（使有些笔划画成鱼形、虫形，效果同缪篆）等。汉印印面设计基本以均衡为主，采用多种朱白相间的方案，达到均衡的效果；文字书写工整、秀丽，线条流畅，但仍不失为遒劲、老辣。总之，汉印印面设计和文字书写往往独具艺心。汉代又创作了一套以驼、龙、龟、蛇等动物造型的钮制，完成了印章整体造型艺术的创作，对后世玺印艺术影响极大。东汉发明造纸术，用印较用于泥封方便，并且更加广泛；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竞争激烈、自由发展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印章艺术的又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印制变大，朱文印渐次增多，文字也逐渐多起来。一方面继承汉印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新创造，如印文中出现悬针篆，使印面产生大块留空和密不透风相应的新奇效果。又北方战争频仍，制印多用鑿凿方法，呈现古朴苍劲的风格。唐宋官印钮制简单化，主要原因是官印改成官府印，官员个人不再随身佩带印章，官司印藏在官

府中，由专员掌管。其时官司印印制增大，印面文字多为朱文，为填满印面，文字笔划出现屈曲、重叠的现象，又采用隶书、楷书入印，可以说唐宋官印一反汉印规制，开创了印面设计和文字书写比较随意、自然的风格。其实唐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却是各种各样私印，不仅印面形状不限于方形或长方形，而出现椭圆、葫芦、不规则形等，而且以年号、馆阁书斋名、收藏鉴赏等文字入印，书法更是遂文人心意，不拘一格，显得活泼多变，一发可爱，为后来艺术流派印章奠定了基础。辽、金以至元、明，官印风格无多大变化，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威慑汉人的目的，增大印制；又出于惟恐汉人讥讽不识汉字的心理，于是在书写汉篆时特别的工整。由于印面的增大，需填满印面，于是将笔划反复重叠，产生九叠、八叠、七叠等名目。平心而论，叠篆使巨大的印面均衡地填满，有一定的艺术成就。但它把平衡的布局推向了极点，线条粗细一律，印面朱白布局的平均分布程度简直就像用尺量过的，类似于机器制作，就未免流于呆滞，叠篆也显得十分的无聊。均衡和工整本来也是一种美，但一旦把它推向极点而定式化，那就是艺术的堕落。明清艺术流派印章的出现，恐怕就是对官印的反动（革新）。清代官印也不采用叠篆，左清篆而右汉篆，汉篆都写成标准的小篆，工整、均衡，刻制得十分精良，尤如机器制造。明清艺术流派印章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历朝官印，使篆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第八，印章作为文物，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没有

人为制定的制度，也会形成属于不同时代的特点，更何况自秦汉以后，历朝都制订了官印制度，因此印章自有其名物制度。虽然说先秦时代印文称玺，适用于国王以至民众，印章材料用玉、金、银、铜、牛角、象牙等也没有规定，但先秦玺印多为铜质，少量玉质。印面大小多在方寸之间，也不拘于正方，印钮多为穿钮和鼻钮。秦汉制定一整套官印制度，从印文称玺、印、章，印章材料用玉、金、银、铜、铁，钮制雕刻螭虎、骆驼、龟、蛇、穿、鼻，到尺寸大小，以至于与玺印有关的绶带用多少丝、黄、紫、红、绿、青、墨等颜色、长短等也都作了规定。皇帝用六玺，白玉质，螭虎钮（即龙钮），六玺的印文作“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不一，并配以黄绶。皇后和诸侯王的印章虽然也称玺，但印面小于皇帝的玺印。诸侯王玺起初用玉，后来改用黄金铸造，大概因为玉石不易得，雕刻玉印又是件艰难的事，故改。列侯、丞相、大将军等用黄金印，龟钮，印文称章。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官印银质，印文称章，龟钮。千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员都用铜印，鼻钮，印文称印。百石以至斗食吏则视情况颁发印章，有的佩印，有的不佩印，称半章印，即正方形印章的一半，成了长方形印章，铜质，穿钮。事实上汉代的印制也是有变化的。汉代的私印基本仿照官印，拥有私印者大体上也都是有身份者。魏晋南北朝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以品位给印，二品以上，金章紫绶；三品官员，银章青绶；但宫廷中的三品以上官员除了有金银之别，印文亦复称“印”，不称